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11.006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邱永志.全球化时代前后的“国际货币”与白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1):191-196.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11.006.



Citation Format: Qiu Yongzhi.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nd silver: Before and afte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1): 191-196.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11.006.

全球化时代前后的“国际货币”与白银

邱永志

(云南大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全球化时代之前,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不少跨越多个地区甚至洲际的“国际货币”,尤以南亚经贸圈的贝币、中世纪地中海经贸圈的金银铸币、环中国海域经贸圈的中国宋代铜钱为代表,但它们多不具备跨区域的支付结算功能,作为流通商品的特性与区域流通的地性更为突显,背后也未有分明的层级秩序构架。近代早期的贵金属白银系全球化时代以来首个国际货币,它不仅连接着全球的经贸往来,促进着全球化支付结算的展开,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有着日益浮现的层级秩序构架。在此过程中,明代中国和西班牙先期受到白银流入的冲击,并一定程度影响着国家命运的走向。

关键词:白银;国际货币;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1-0191-06

一、白银流入冲击两大强国

17世纪40年代明亡清兴之际,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在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离乡北游,脚步遍及北方诸省。他发现,历经明代一条鞭法折银改革后的北方很多地区,此时正饱经白银缺乏之苦。经过山东登莱等地时,他看到滨海之人因为地处偏僻,几乎无法获取白银缴纳赋税。后游历至关中地区,顾炎武发现此地民众虽然历经丰收,却仍然要售妻卖子,背后的一大原因就在于缺乏白银。于是,顾炎武在检讨明亡清兴教训的著述中沉重指出,明朝不坚持铸行铜钱、转向使用白银是王朝陷入危机的一大原因,并建议王朝国家应吸取教训、不断开铸铜钱^[1]。无独有偶,稍早或同时代的靳学颜、谭纶、葛守礼、徐光启、钱秉箴、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多持类似看法,甚至这股反银的思潮一直延伸到清代中后叶。现代人多视白银为晚明经济繁荣的助推之手,但为何在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招标项目“古代边疆市场发展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3VLS018)、“中国历代边疆经济开发与治理研究”(22CZS0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货币转型下明代信用发展研究”(22CZS034);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支持计划项目(2024LTQN603)

作者简介:邱永志,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暨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些明清之际的知识精英眼中却成为祸害之手?

16—18世纪,作为全球白银主要流入之地、有着白银终极窖藏之称的中国,曾被贡德·弗兰克认为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他指出:

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密”。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2]

这个观点曾引起不少学者的惊诧乃至怀疑。那么,白银大量流入的事实到底是证明中国是那个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心,还是如那个时代不少货币知识精英所论,身患白银之毒,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反差较大的认识究竟隐含着怎样的内在玄机?

无独有偶,近代早期还有一个国家也因白银的大量流入而深受影响,非议之声迭起。现今不少学者认为该国患上了深重的白银之毒,受其折磨不浅。这个国家就是15、16世纪称雄世界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作为占据并控制世界第一大产银地的西班牙帝国,曾通过血腥的征服控制了南美印加帝国,后主导控制了世界最大的银矿出产地波托西,从此开启了数个世纪美洲金银大量流入西欧的时代。美洲金银尤其是白银的大规模流入,是大航海时代的延伸结果,助推了商业革命的火焰,大大缓解了西欧14世纪以来的金银荒,使整个西欧社会都卷入了价格革命的浪潮之中。在价格革命的冲击下,国内生产结构较为简单、阶级层次分明的西班牙遭遇重创,很快成为欧洲最大的白银“漏勺”,手中积蓄的白银如洪水般纷纷流向其他国家。卡拉瑟斯通过比较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因长期依靠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导致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严重。其工业能力难以与其他国家竞争,且随时间推移日益衰微。此外,西班牙的银行业也被热那亚人、葡萄牙犹太人控制,金融市场远远落后于法国、荷兰、英国。即使在帝国鼎盛时期,美洲白银虽源源不断流入西班牙,但大部分金银被用于进口工业制成品,直接支付给了西欧先进国家^[3]。与之相对,拥有先进工商业结构、国内经济系统日益复杂的荷兰和英国,不断吸纳西班牙流出的白银作为交易润滑剂,且进一步转化为金融体系的资本,大幅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并相继成为17、18世纪西欧以及全球霸主。在此过程中,西班牙快速衰落为西欧落后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一直落后于荷兰、英国、法国等。缘何白银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能够使东西方两大强国同步遭受巨大冲击,深受其影响,甚至造成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

这一切的一切,或与很多因素有关,然而白银绝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或者是反映各自深层问题的重要指示器。

二、前全球化时期的“国际货币”

近代早期,贵金属白银系全球化时代以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它曾穿过深山,跨越洲际,周流各大洋,为官员、商人、海盗等人群所疯狂追逐。它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商业运行的面貌,影响着很多国家货币、财政与经济制度的走向,也塑造着国际新秩序格局。然而,在全球化时期以前,人类社会也曾出现过不少充当地区性或跨越洲际的“国际货币”。它们与近代早期的白银存在何种性质的差异呢?

在前全球化时代,贝币、金银铸币乃至宋代铜钱等都曾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区域充当过局部性的“国际货币”。不过,它们似乎都未像近代早期的白银那样,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深刻的

影响。

首先便是产自于海洋的海贝,以及由此演化而成的贝币。在全球各海域出产的两百多种海贝中,曾经有两种扮演过贝币的角色,主要是货贝(即黄宝螺),其次是环纹货贝(即金环宝螺)。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是货贝最大的供应地。人类获取海贝并充当重要装饰品始于远古时代。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不少遗址中曾出土过数量众多的贝币,距今7 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距今4 000多年且充满谜团的三星堆遗址、距今3 000多年且被认为可能是夏代遗迹的二里头遗址都出土了大量虎斑贝、环纹贝等。除此之外,西亚、印度洋区域、东南亚、西非、美洲、太平洋不少岛屿等也多有各类海贝发现。由此可见,海贝在史前时代曾遍布全球众多地区。但它是否作为一种全球货币在行用呢?学术界长期为之争论不断。

2021年,全球史学者杨斌在《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中,深入细致地揭示了贝币在前全球化时代的流通面貌。他认为,史前时代的海贝虽在众多地区被发现,但可能并非充当货币,而是作为贵重装饰品或祭祀用品而存在,实质是权力和秩序的象征物。贝币成为通用的货币是在人类走出史前时代,出现规模不等的交换或铸币之后。而且,各地区以贝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时间进展不一。比如,在印度、孟加拉地区,贝币成为流通手段是在4世纪以后。到了8世纪以后波罗王朝和塞纳王朝统治时期,贝币甚至取代官方铸币,承担着税收、交易等主要功能。在中国云南,贝币自南诏时期(9世纪)被重新成规模引入,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成为连接东南亚与中原的重要媒介。自8、9世纪至19世纪,贝币才是真正意义上流通于印度洋地区、中国西南、太平洋、西非等地的区域性“国际货币”。杨斌认为,持续近一千五百多年的“贝币世界”实际展现了曾被忽视的全球史进程。贝币后来成为众多区域的流通货币,事实上表明它是首个全球性货币体系,早于近代初期的金、银全球货币体系,是历史上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全球货币网络。他认为:

大额度的贵金属货币只能在社会精英当中流通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机会拥有和使用它们。正因为这些贵金属很少在交易中出现,从其使用频率和社会阶层看,它们似乎不应该被视为通用货币,至少它们没有那么流行。正是这种历史状况下和这一经济凹处,贝币挤入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交易,使得最接地气的市场灵动起来。也就是说,贝币的“微小”,正是它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是它成为第一种全球性货币的关键。^[4]

杨斌虽也强调贝币所具有的地方性及其在跨空间流动中多是充当商品的角色,但他始终认为,因贝币联动的区域较多,堪称是最早的全球性货币网络,是一个由市场力量推动,不存在“中心—边缘”等级秩序构造的货币网络。不过,有学者认为这种所谓的贝币“全球性”更多是区域性流通网络的叠加,而非真正统一的货币体系。笔者认为,此种质疑有一定道理。正如杨斌所承认的那样,贝币网络中未形成明确的层级秩序构造,也并非在跨区贸易中都履行着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等职能。故而,仲伟民在对该书的书评中指出,贝币的在地性流通可能更值得强调与关注^[5]。

罗马统治时期至中世纪晚期金银铸币作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历史屡见不鲜,当然这主要是出现在近代早期以前的地中海世界。经济史学者奇波拉曾把中世纪这类货币形象地比喻为“中世纪的美元”,指出这种国际通货(某种超级货币)的现象,在欧洲经济史上算不上新鲜事物。继而,他追溯了几种重要的区域性“国际通货”。

第一种出现在中世纪的早期(5—7世纪),是拜占庭帝国铸造的金币苏勒德斯,它被认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近东富裕的城镇、北非的市场、意大利的港口、法国和西班牙的修道院和城堡——享有绝对的威望。希腊修士科斯马斯曾描述它:“在地球一头到另一头的每个地方都为人们所接

受。所有人、所有王国都景仰它,因为没有一个王国的通货可以与之相媲美。”^[6]7世纪晚期,拜占庭金币第纳尔与波斯银币迪尔汗共同成为地中海世界强势的国际货币。

第二种出现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前半叶,是意大利铸行的白银硬币格罗特,它与诺米斯玛和第纳尔并行使用,在地中海地区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国际通货。

第三种是13世纪晚期意大利诸商业共和国城邦发行的金币,以佛罗林、杜卡托为代表。从那时起到中世纪末,地中海地区的“美元”就是意大利各个共和国所发行的金币。事实上,最后的这个时段又可以分为两段: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末,佛罗伦萨的金币佛罗林最具声望,佛罗伦萨的铸币官员可以自豪地宣称“这种金币在全世界通行无阻”;在15世纪,则是由威尼斯的金币杜卡托担当国际通货代表。

奇波拉指出,这些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中世纪美元”,原因有三:一是它们都是高价值的单位,铸造重量大体维持在3.5~4.5克,可以较好地履行记账单位职能。二是它们的铸行长期保持了内在稳定性,重量和纯度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因此,除履行记账单位的职能外,支付和结算职能也较为稳固。三是铸造这些货币的政权广泛参与了周边国际贸易并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与之十分类似的还有中国宋代的铜钱,它可谓是东亚版的“中世纪美元”。

中国宋钱在10—17世纪曾广泛流通于东亚、东南亚海域(学人谓之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中国海域)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唐宋时期尤其是两宋,中国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这是相对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允许并鼓励民众出海)、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步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宋代的中国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多方面优势。据黄纯艳研究,主要有两大比较优势。

一是商品结构方面的优势。“南海I号”发掘的近20万件套商品中有瓷器、铁器、金银、铜钱及丝绸等,与宋代史籍记载一致。这些商品海外诸国不能生产,或生产质量远逊于中国。诸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资源性商品,中国在商品结构中占据有利地位。

二是技术优势。宋代海船船体大,普遍应用了水密隔舱和多层舷板技术,增强了船舶的强度和抗沉性。北宋后期中国人率先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海船有专司“针盘”、掌握“针路”的“火长”,可以帮助人们全天候进行深海航行,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和效率。

两大优势的背后是宋代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当时亚洲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市场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各国皆乐于与中国开展贸易。亚洲东部海域诸国不仅积极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而且主动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化^①。

宋代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使宋钱大量外流,宋钱逐渐在亚洲东部海域国家广泛行用,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在除高丽以外的东亚诸国成为最主要通货之一。时人说“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便是明显的体现。日本学者井上正夫、黑田明伸更是将此称为东亚的“宋钱时代”,并有相应的专著予以论述^②。

宋钱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外流,并被亚洲东部海域诸国所热捧,前提条件是中国铸钱供应量的规模巨大且供应稳定。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中国历代王朝中铸钱数量最多的时期(另一铸行规模较大

① 中国新闻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黄纯艳:宋代“海洋大国”如何以贸易联结世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723299592690244&wfr=spider&for=pc>, 2022年9月1日。

② 参见井上正夫《東アジア国際通貨と中世日本:宋銭と為替からみた経済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2年;黑田明伸《歴史のなかの貨幣:銅銭がつないだ東アジア》,岩波书店,2025年。

的时期是清代),也是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据学者研究,北宋铜钱铸造量接近3亿贯。辽、西夏、金、日本、交趾,乃至东南亚诸国都在行用铜钱,且推动了周边诸国仿照宋钱铸造货币。黑田明伸将这个铜钱区称为“环中国海铜钱区”,并将这个地区的特征描述为接受宋钱为共同特征,以福建南部为基点,东北扩及日本,南面从交趾、中南半岛,直到马六甲、爪哇。笔者研究发现,除了福建南部地区外,广州出海口地区也是中国铜钱大量出口的地区。宋钱的持续出海,基本延续至16、17世纪的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叶,各种仿宋私钱被大量输往环中国海铜钱区,引发整个环中国海铜钱区的震荡,内部纷纷出现类似的私钱化现象,产生价格波动,导致更稳定的白银趁机介入,为“白银时代”的开启提供了契机。

不过,当时中国的国际贸易主要还是以物货贸易直接交换为主,宋钱也主要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贸易中被贩易,各国对宋钱大多采取许入不许出的政策,因此,宋钱尚无法在亚洲国际贸易中作为统一的核算标准或支付手段使用。宋钱虽表现出很强的“国际性”,但不具有经济和政治秩序构造上的意义。实际上,前述的贝币世界、贝币网络和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各类金银币也具有类似的特性。然而近代早期的白银,却与之迥然不同。

三、白银:全球化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首个国际货币

近代早期的白银,是人类实现全球化以来真正联结的国际货币。如学者指出的:“美洲金银是第一次全球经济形成的催化剂,以致有的学者称世界历史上的早期近代为‘白银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美洲金银产量和流通的影响……美洲金银是早期近代世界贸易体系、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7]作为从重商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媒介,白银的全球流动体现了怎样的秩序构造呢?对此,货币史家荷尼夫指出:

欧洲的这些重商主义政权,本国几乎不出产金银,但是它们有规划地利用对全球市场和金银流动状况更为充分全面的了解,获取了经济上的优势。这样的状况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正是凭借信息上的优势,意大利城邦和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得以控制全球的金银储备,进而在经济上压倒了原本占据优势的欧洲东部。^[8]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3世纪中叶以后,尚处于封建时代晚期的意大利城邦之所以能够铸造通行于地中海世界的金币,源于他们能够利用欧洲出产的铜矿换取北非的黄金,建立起黄金储备,引致欧洲货币的转型。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相继拓殖到印度洋、东南亚地区,他们倒卖胡椒、香料、生丝、丝绸换取北非的黄金和美洲的金银,甚至是马尔代夫群岛的贝币、日本的金银、铜矿。17世纪,荷兰也加入其中。他们游走于亚洲东部海域各大贸易角落内大量倒卖中国的丝绸、瓷器来换取日本的白银、铜矿和美洲金银。18世纪,姗姗来迟的英国也是如此。这些商业殖民帝国善于利用并操纵各地的商贸,利用发达的商业组织形式(如殖民公司)、暴力(战舰)和宗教力量(传教士),借助手上掌握的大量信息,在全球很多地方倒换商品和金银,积累利润。而这些利润源源不断地润滑着母体的经济机器,最终使资本主义体系日益壮大。在这一过程中,白银背后的层级构造秩序日渐清晰,即日益形成明显的“中心—边缘”等级秩序构架。

当然,这些认识只是事后之明,且倾向性十分明显。如果从更早的时间点如10世纪往后观察,我们会看到一幅幅历史的画卷逐次展开。首先看到,西欧中世纪的白银记账本位逐渐转向近代早期的金银记账复本位,而各国的商业革命、跨越国界的重商主义浪潮催促着他们满世界寻找金银。为了黄金和白银,整个欧洲开始喧嚣起来,殖民先锋纷纷踏上寻找金银的梦想之路。最终,他们找

寻到了理想的目标之一——贵金属白银,继而更加为之疯狂。白银的大开发使西欧先进国家开始调整金银复本位制度,应对价格冲击,最终逐步转向单一金本位之路,并建立起日益复杂的近代货币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我们也会看到,10世纪以降的中国在应对日益发达的商业经济时,曾提供了巨大规模的铜钱和精密复杂的纸币制度。然而,这些制度遗产无法有效维持,结果在明代中叶发生重要反转,纸币和铜钱纷纷走向衰败,中国社会自下而上转向使用称量白银。自此开始,中国白银时代的浪潮持续5个多世纪。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东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造就了白银全球化的运动浪潮。随着日本银矿、美洲银矿与中国西南银矿的大开发,全球贸易开始深度连接起来,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银光灼耀的世界图画。

参考文献:

- [1] 顾炎武. 顾炎武全集:第21册:亭林诗文集·钱粮论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4-65.
- [2] 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刘北成,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82.
- [3] 布鲁斯·G. 卡拉瑟斯. 资本之城:英国金融革命中的政治与市场[M]. 李栋颀,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106-107.
- [4] 杨斌. 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461.
- [5] 仲伟民. 在地全球性:从货币理解前现代及全球化[J]. 读书,2024(12):34-42.
- [6] 卡洛·M. 奇波拉. 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与文明:5—17世纪[M]. 宁凡,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27-28.
- [7] 施诚,石力. 早期近代美洲金银产量及其流向研究述评[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201-224,230.
- [8] 荷尼夫. 走向世界的人民币: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货币史[M]. 李守旗,译.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8:113.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nd silver: Before and afte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Qiu Yongzhi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P. R. China*)

Abstract: Prior to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various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emerged successively across the world, spanning multiple regions or even continents. Notable examples include cowrie shells in the South Asian trade circle, gold and silver coinag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trade network, and Song Dynasty copper coins in the maritime trade ring surrounding China. However, these currencies largely lacked cross-reg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function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s circulating commodities and their regional, localized circulation were more prominent, and behind them, there was no clear hierarchical order structur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recious metal silver becam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ince the globalization era. It not only linked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More importantly, a gradually emerging hierarchical order structure underpinned it. In this process, Ming China and Spain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be impacted by silver inflows, which influenced the trajectories of their national destinie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silve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 周沫)